

“临清砖，北京城”，这是在临清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了一句赞语，意指临清贡砖在古老北京城的兴建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其“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苗实，不碱不蚀”的独特品质，自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之日起，临清贡砖便源源不断地沿着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在临清市博物馆，珍藏着一批刻印有“大工”、“内工”、“寿工”等字样的各式临清贡砖，这可是当年供给太和殿、天坛用的贡砖，为确保品质，每一块砖上详细标明了产地、年代、客户、工匠等信息。

明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初，下令推掉元朝的土垒城墙，营造新都北京。浩繁的工程离不开大批的砖石建材，他于是颁布山东、河南、直隶等省俱建窑烧砖，并在临清设工部营缮分司，专司窑厂的修建和贡砖的烧制。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裁营缮分司，由山东巡抚领之。因而临清成为明清两朝皇家建筑用砖主要基地，临清的砖窑厂在当地也被称为“官窑”。如今在故宫、天坛、十三陵及清西陵，依然随处可见临清贡砖。

临清之所以被选作贡砖烧制基地，首要因素是这一方特别的“水土”。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壤细腻，富含铁质，每次黄河泛滥后，总会留下一层细沙土，覆盖在当地的黏性土壤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层沙土一层黏土的叠状结构，沙土色浅白，黏土色赤褐，层层相叠，如莲瓣一样均匀清晰，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莲花土”；漳卫河流经此地，河水清澈无杂质，俗称“阳水”。用漳卫河水与莲花土和泥烧制的砖，异常坚硬。经现代科学仪器测试，合格的临清贡砖其硬度达到200号，比许多天然的石头硬度都大。1957年定陵发掘时，吴晗、郭沫若、郑振铎曾亲临现场，看到建陵用的已有300多年历史的临清贡砖不碱不蚀，声有铜音，赞叹不已。

其次是临清贡砖烧制工艺复杂精细。为确保质量，临清砖窑有一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要经过选土、碎土、过筛、熟土、养泥、醒泥、制

[镇馆之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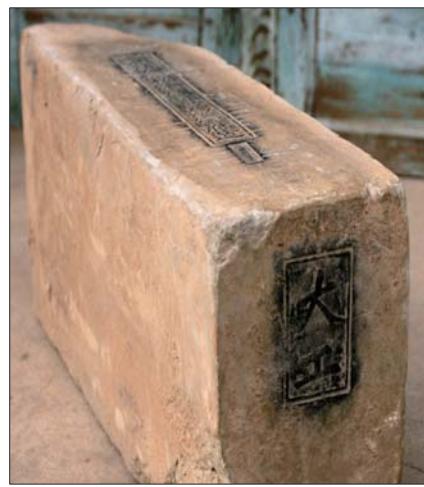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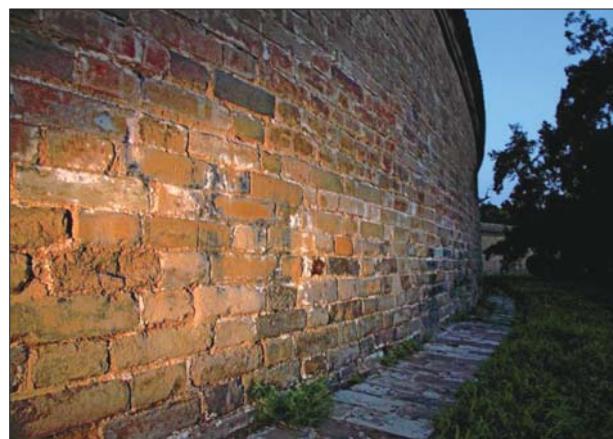
从大运河『漂』到紫禁城

□周东升

坯、晾坯、盖戳、装窑、焙烧、出窑、初检、复检等18道工艺。每一批砖从进窑到出窑，猛火足足要烧上一个月，灶里的火24小时不停。烧砖用的“莲花土”，过完大筛子，还要过一遍小筛子，然后再像滤石灰一样，将土用漳卫河水过滤，滤满一池，待泥沉淀后，再从滤池中将泥取出，用脚反复踩匀，才能用来脱制砖坯。一个最好的工匠，一天也只能脱400块砖坯；一般的，一天也就脱二三百块。

还有就是临清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临清位于会通河与漳卫河的交汇处，扼南北漕运之咽喉，是京杭大运河沿岸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西北控燕赵，东接齐鲁，南界魏博，河运直抵京师，水陆交冲，畿南一大都会也”。

临清贡砖的运输在明初实行“就漕艘搭解，后遂沿及民船装运”。永乐三年(1405年)规定，船每百料(载重计量单位)带砖二十几块；明天顺年间，令粮船每艘带砖40块；嘉靖十四年(1535年)更增加到粮船每艘带120块，民船每尺带12块之多。官民商船派



▲从明朝嘉靖年间伫立于北京天坛回音壁北面至今，这些从大运河上“漂”来的临清贡砖已历经了近500年的沧桑，岁月荏苒，它们依旧严丝合缝、坚固如昔。

◀不碱不蚀的临清贡砖。

带砖料是强制性，也是义务，如有损失，还要责令带运者赔偿。

临清砖窑依河而建，同样是出于运输方面的考虑。明清两代，从临清西南15公里的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再到临清东北部的张家窑，最后延续到临清东南部的河隈张庄，窑口绵延30多公里，共计384座窑。有些窑口分布十分稠密，如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不到10公里的运河长度，有窑72处，有的仅相隔20多米。

北京营建常年不断，用砖最多的一是永乐，二是嘉靖。据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记载，北京在临清“岁征城砖百万”，这仅指城砖一种。临清砖窑烧制的贡砖还有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券砖十余种。按平均每窑2500块计算，每窑每年出砖3万块，384座窑年可出砖1000万块以上，生产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烧制好的贡砖要逐一检验，“敲”和“看”是验收的主要方法，“以体质坚细、色白如雪、响声者方可入选”，要敲之有

声，断之无孔。每块合格的成品砖都要用黄表纸包好，才能装运上船。解送到天津后还要重新敲验，在这里“历年搭解砖块驳换颇多，其挑出哑声及不堪用砖，俱存贮天津西沽厂”。乾隆十四年(1749年)《临清州志》记载：“砖价每块给工价银二分七厘；如挑出哑声者，每块变价银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变价银一厘七毫。”经过几道苛刻的验收程序，不合格的砖绝对进不了北京。

为加强质量管理，便于责任追究，每块临清贡砖上都刻写有生产年月、地点以及窑头、作头和匠人等姓名，一旦贡砖出现问题，即可直接追查到人。如“万历二十七年窑户梁应龙，匠人赵田造”等字样便是常见形式。

几千年来，此砖不碱不蚀，质地坚硬如石，显示了临清贡砖烧制工艺的高超。而馆藏的这些贡砖，对恢复其烧造技艺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也为运河文化的深入研究及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史海钩沉】

一副对联中的“海关”

□孙慧铭

笔者近日从一份资料中看到一副对联，是曾任过济南知府、时任第四任海关监督的龚易图为“海关”题写的。对联内容如下：九万里斯下，乃今培风，合象昧译鞮，相彼往来，吾为东道主；三十年之通，以制国用，收鱼盐蜃蛤，权其轻重，实佐大司农。海关在百余年前可是名副其实的山东第一关，而与张之洞齐名的清廷谏官龚易图所书写的对联，是烟台开埠历史的物质见证，是烟台在中国近代史上80多年屈辱历史的沉痛记忆。

在烟台山西路有一座风格独特的老房子，它正是当年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经过抢救性维修，如今这座老房子早已“修旧如旧”。海关，即“山东烟台海关”，因晚清大臣奏章和皇帝寄常把山东省简称为“东省”或“东境”，故有此名。如英国人阿美德先生在他的《图说烟台》中说：“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导致了一个结果，即1862年3月烟台开埠，允许进行对外贸易，在此之后就设立了烟台海关，也称为海关。”

而另一种说法是，海关又称“东海洋关”，主要收缴“东海洋税”。其实，这里的“洋关”是指“海关税务司署”，因由洋人把持，所以民间习惯称其为“洋关”。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由清政府建立的“海关监督衙门”则被称为“常关”。

恰恰是因为当时“海关监督衙门只能管理中国帆船及所载货物，而外商船舶及其货物的管理被海关税务司署控制”的屈辱环境，海关的对联中才会出现“吾为东道主”这样的语句。

而题写这副海关对联的登莱青兵备道兼第四任海关监督龚易图，作为清咸丰九年己未科(1859年)二甲进士，如今留给我们的印象，主要是修建了双骏园藏书楼，是与陈宝琛齐名的“藏书家”。其实这位福建闽侯人从1863年至1877年间，曾在山东为官十五年，历任东昌知府、济南知府，登莱青兵备道兼海关监督等职。

据史料记载，龚易图先随僧格林沁平捻剿匪，因军功留山东为官。龚易图不但政绩卓著，而且才华横溢，精通书法，可谓“文武双全”，山东许多地方留下了他的墨迹，例如济南大明湖、济宁太白酒楼、烟台蓬莱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烟台毓璜顶“小蓬莱”的落成正是在他的任期之内，而烟台毓璜顶小蓬莱石坊上那副号称胶东半岛上口气最大的对联，也是由他题写，此联为：天下文章莫大于斯，一时名士皆从其游。

对于龚易图正义无畏的性格，从一些史料记载的关于他的事件中可见一斑：早年入翰林，直言敢谏，同张之洞、张佩纶、宝廷被誉为“枢廷四谏官”；1869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杀了慈禧太后的亲信太监安德海，帮忙策划这一事件的就是当时的济南知府龚易图。

作为文人，龚易图确实是才华横溢，海关这副对联中有多处出自古籍：上联中的“九万里斯下，乃今培风”，出自《庄子》的《逍遥游》。下联中的“三十年之通，以制国用”语出《礼记·王制》。“收鱼盐蜃蛤”指的则是征收进入通商口岸的商船上货物的关税。从“鱼盐蜃蛤”中，其实也能证明了当时“海关监督衙门只能管理中国帆船及所载货物”这个现实。“实佐大司农”中，“实”为“积实”，原指“谷粟财货等”，这里引申为“征收的关税”；而“大司农”为中国古代官职，秦汉时便是全国财政经济的主管官，一直沿用到魏晋，因明清两代以户部掌管粮田赋，故又把户部尚书称为“大司农”。

整体上看龚易图的这副对联，其实并不特别符合联律的平仄要求，但作者从通关的角度来写，上联有其对宣扬国权的声音，下联以国家的经济为思考点，这分明是具有爱国为民、正直敢言性格的作者一颗拳拳赤心在呐喊，以宣扬国家主权。

【老照片】

1934年的全家福

□姜银照

在我的家里珍藏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据三叔在世时讲，是我们家1934年前后在老家北屋前照的一张全家福。睹物思人，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爷爷，想起伯父以及他们对于后辈认真读书、老实做人的谆谆教诲。

我的老家在滨州市沾化区大姜家村，是一个世代务农的普通家庭。我爷爷虽然一生务农却理家教子有方，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为了供孩子上学把家里的10亩地都变卖了。我的伯父姜子修1931年前后从省立四中考入北京大学，后参加革命工作，加入过鲁迅组织的左翼作家联盟，因宣传抗日救国还曾被捕入狱，被时人誉为“民主战士”。解放后，伯父常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曾担任黎明中学校长，先后两次被选为济南市政协副主席。

伯父在北大读书期间我家经济并不宽裕，为了继续学业他不得不两次中止学习担任英语教师，筹到部分资金后再返回北大继续读书。我所珍藏的这张照片就是1934年伯父休学期间拍摄的，当时拍照还是一件新鲜事儿。

照片中，从左至右分别是三叔姜子玉、父亲姜足文、姑姑、爷爷、伯父和伯母。伯父身穿呢子大衣，足蹬皮鞋，怀里抱着婴儿期的堂兄姜银波，他的打扮可以说在当时很时髦，跟其他人的长袍马褂形成鲜明对比。从衣着上分析，这张照片应该是拍摄于春节之后不久，门上的对联还能看出“实现三民主义”的字样，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

照片中的北屋也跟着全家生活的变迁历经风雨。最先，由于爷爷的教导和伯父的带动，我家多人参加革命，北屋慢慢竟成了生产队队部，再后来演变成了村里的小学，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1986年我回沾化老家接父亲到济南安度晚年，北屋已经破败不堪，挂在墙上的这张照片也已经泛黄损坏，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一起带回珍藏。

